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

BOXUE HONGRU YU QINGCHU XUESHU ZHUANBIAN

赖玉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

BOXUE HONGRU YU QINGCHU XUESHU ZHUANBIAN

赖玉芹 著

明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赖玉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004 - 8378 - 6

I. ①博... II. ②赖...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49.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6691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14.5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总序

从1978—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了整整三十个年头。思想的不断解放、观念的不停进步、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今日之中国与三十年前之中国几有天壤之别。变化无时不有，变化亦无处不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回首过往的三十年，中国历史学在承继前代之功与反思旧有之弊中不懈前进，其变化为学界有目共睹。一方面史学走出“家门”，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中国史学已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史学遵循自身发展的轨迹，不断演化着学术转型，寻找本土化的学术路径。其中，一个巨大的成就令人瞩目，这便是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社会史的崛起。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之兴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度复兴，此已成史学界之公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迄今，三十年的历程，中国社会史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过程，其成就不言而喻，伴随着社会史领域一批优秀成果的推出，一批学人迅速成长、成熟，开放的学术心态、广阔的学术视野、良好的学科素养、明确的学术目标、新颖的研究视角、多维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则使得这个领域弥漫着浓烈的对话氛围和创新意识，充满着勃勃生机。

面对史学领域的变化和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欣喜之余，静心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明晰，以下数端应是目前社会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其一，社会史秉承“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坚持写出“底层的历史”，无疑是符合这一领域学术研究主旨的，但一味地、长期地目光向下，排斥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精英层面的关注，则有可能使社会史的研究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社会史研究引入误区，犯下与传统精英史学相同性质的学术弊病，即重视一端，忽视一端，形成学术视阈中的盲点。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与

学术素养，任何群体、阶层、领域都应该是其研究的对象。

其二，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态势之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失衡现象也越来越突出。我们姑且以“优势区域”和“弱势区域”来作简单的区分。前者主要是指研究力量雄厚、主流学者云集、成果积淀深厚、资料发掘充分、视点广泛、视阈开阔、学术对话频繁的研究区域；后者与前者相比则反差甚大，门可罗雀、稀疏冷清，学术界关注不足。这种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区域对话以及社会史研究整体史目标的实现。

其三，社会史研究十分强调多学科交叉与渗透，因而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便显得特别重要，这是社会史研究“科学化”的关键所在。然而，今天的社会史研究对于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仍是有限而不足的，多数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基本没有体现出作者的学科素养，对某些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仅仅是停留在表层，如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方法的运用，只在于收集资料，体验与观察则完全忽略。

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明清社会史的研究，围绕博士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规划选题，潜心布局，以团队的形式共同致力于社会群体与地方社会力量的研究，已具备了很好的研究基础，并围绕这一主题，完成了一系列相关课题的研究，同时后续的纵深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这个团队的学人已分布在各地各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立志长期围绕“群体·社会”这一大的主题展开不断的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试图对于上述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诸端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索。比如，在研究对象的区域选择上，尽量加强对于“弱势区域”的关注；在研究对象的群体选择上，尽量关照各类群体，尤其是学术界关注有所不足的群体。

这套丛书分为两大系列。一是群体研究系列。丛书中所确立的群体研究对象，当为广义的社会群体，群体特征大体为具有身份一致感和共同利益的人群，且以研究的问题为中心，将群体设定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既包括社会上层，也包括社会下层，同时，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诸如皇帝、阁臣、言官、翰林、地方士人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皆为丛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明清社会群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则是各群体研究重点探讨的问题。二是地方社会研究。我们力图打破传统史学追求宏大叙事风格的研究路径，通过对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明清社会的理解。选题将涵盖地方社会秩序、地方公共事务、地方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揭示明清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关注国家、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行为举措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地方各领域与社会变动的关系，前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关联问题，其中，不少问题的考察将与

整个中国近代社会联系起来。

丛书的主旨在于学术创新，或从新的视角、领域，或以新的方法、观点，表达一种真正的学术追求。在研究方法上，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类，追求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方向，力图展现具有特色和深度的学术研究。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有着一个愿望，就是能让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结论具有更多地参与国内、国际学术对话的可能，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当然，也期望求得方家指正。

吴 琦
2008 年 12 月
于武汉桂子山

序

在全球视野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脉络。这一脉络既与王朝的更迭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不完全随着王朝的变化而变化；既与社会的重大转换构成互动，又有着相对独立的品质特性。然而，无论哪个历史时期，学术思潮、学术活动以及学术群体都是我们考察国家、社会与时代的有效视角。

清代学术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从早期章太炎、刘师培对清学的关注，到梁启超提出“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清学“理学反动说”遂成为学术界对清学的一种代表性评价。此后，又有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学人们或赞成，或反对，大体无出以上几种观点。其实，清代学术体系庞大，内容繁杂，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性。过多地进行简单梳理，容易使我们的研究走向空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做的研究工作应该是切入更具体、更深入的层面。

清初学术，上承明代理学，下启清代考据学，成为明清学术转换的重要关节点。然而，由于社会的变动，学术演进在这个历史阶段呈现一种多元的态势，其走向也因此呈现出复杂甚至捉摸不定的状貌，学术界的评价也因此各执一词。我们无须纠缠于诸如清初学术发展的主流究竟是什么、清初学术的实质是什么等问题上，而应从不同的侧面去揭示这个时期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因、路径以及上下对接情形。任何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在发生与演变过程中，都会触及和关联社会的诸多方面，这也便给我们提供了考察问题的诸多视角。

随着社会史的崛起，史学研究的领域与视角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学术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不少方法的探索与观点的创新。仅以美国学者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为例，该书融汇学术史与社会史，对于明清之际从理学到朴学这一学术转变的外在学术背景与内在学术理路进行丝丝入扣的分析。作者以学术为主脉，考察了明清之际中

国社会与精神生活，对于官方政策、民间社会以及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互动与学术机制的建立作了深入的揭示。该书为我们理解清代学术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视野。我们惊喜地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人摆脱了学术界长期以来从纯学术的视角审视学术发展的窠臼，在学术史的研究中，广泛地关注社会各个层面的关联问题，把学术史的研究不断地推向深层。近期，再读赖玉芹《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的书稿，此种感受越发强烈。

赖玉芹是我的首届博士生。2001年，我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与熊德基先生共同培养文化史文献的博士研究生，恰逢赖玉芹由熊德基先生招入，由于她表现出对明清思想文化的强烈兴趣，于是熊先生让我接手培养。在指导过程中，我一直强烈地感受到该生孜孜以求、勤学苦读的治学精神以及端正严谨的优秀学品，对她做好一篇优质的学位论文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在日常的研讨中，赖玉芹总是能够结合所读材料，提出对于问题的看法，尤其是能够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不断提出设想。在不断的思索与论证中，她提出了“博学鸿儒科”的问题，希望从学术群体入手，研究学术发展。这确实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课题，虽然不少学者的研究多有涉及，但“博学鸿儒科”对于清初学术的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尚无深入研究；博学鸿儒在当时属于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群体，人们更多的是从事件本身去认识和解读这个群体，对于他们的总体学术成就和作用缺乏研究，也无定论。于是，选题确定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十分明确。客观地说，选题有难度，但学术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此，赖玉芹不避寒暑，奔波于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之间，阅读大量清人文集，抄录资料，做了大量的笔记。她经常跟我汇报资料查阅的进展，每一次，我都能从她的收获中，感受到她的进步，体会到她的喜悦。在论文修改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较强的领悟力，每次交谈之后，她都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最终，她的博士论文《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顺利完成，让人倍感欣慰！

攻读博士学位是一种磨炼，对于赖玉芹而言，这种磨炼较之常人更多。在爱人的全力支持下，她克服各种困难，无视外在因素的纷扰，全身心地投入专业学习和研究之中，表现出了一种当代学子中并不多见的品格。几年不懈的努力与付出终有回报，2005年12月，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喜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到中南民族大学工作之后，她一边教学，一边进一步查阅资料，几易其稿，不断完善，眼前的书稿更为成熟。

作为一个读者，我对案头这部书稿的学术价值有如下评价：

第一，该成果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所征召的博学鸿儒科为研究对象，将重大的历史性政治事件与一个时期的学术发展结合起来，审视清初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揭示特殊群体之于学术发展的重大意义。清初学术发生了从明代理学到清代乾嘉考据学的转变，这方面不乏研究成果，诸如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祖武的《清初学术思辨录》等，他们指出了明清之际的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等开启了乾嘉学派，但由明清之际到乾嘉时期考据学的蔚为大观，中间尚有几十年，这几十年的学术演变过程及学者所发挥的作用，学术界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揭示，研究上存在着一个缺憾。赖玉芹提出了“博学鸿儒一代学人”的概念，并肯定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贡献，着力讨论了清初学术界从顾炎武到乾嘉学派的脱节问题，视角新颖，立意甚高，体现出了很好的问题意识与对话意识。

第二，作者阅读了大量的清人文集和笔记，整理爬梳，对所研究人物的性格、心理、交游范围、兴趣等都力图去知悉和了解，便于更准确地把握人物及其学术思想。通过对众多人物的分析与比较，形成对博学鸿儒群体学术动向的总体把握，力求论从史出。对于史料，不拘奏牍、碑铭、传记、史论、信札、诗文等，一概涉猎，捕捉信息，不放过任何一处“边角余料”，因此材料的采用不仅丰富、扎实，而且细致入微，揭示出曾经隐藏在一般史籍叙述中的历史人物的真实状态。

第三，该成果在群体研究方面，进行了很好的、颇有价值的探索。目前，社会史秉承“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写出“底层的历史”，结果导致一味地、长期地目光向下，排斥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精英层面的关注，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社会史研究引入误区。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与学术素养，任何群体、阶层、领域都应该是其研究的对象。所以，赖玉芹的这一著述，执著地关注知识分子阶层，从社会史的视角观照精英阶层。

另外，书中许多做法可取、新见频现。如在研究博学鸿儒一代学人对乾嘉学派的影响上，作者关注到义理和考据方法两大方面。在义理方面，一反此前的研究者总是抱着乾嘉学者“竭而无余华”的观点，认为乾嘉学者具有思想上的创新，而清初的博学鸿儒毛奇龄正是对他们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在有关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和思潮发展的脉络与走向上，把握准确，且条分缕析了明中后期众多的学术脉络是如何在清初形成“经学”主脉凸显的。有关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原因，除了内在的学理方面外，外在因素中，作者认为，以往学者所持的“清廷的政治高压”有些绝对，因为当时康熙帝采取的是一种笼络、控制和顺应政策。在研究博学鸿儒学术过程中，作者从他们的学术交游群体的角

度来看其所受到的学术影响，亦独到可取。

当然，该书并非完美无缺，因为思想学术方面的研究往往需要具备很深厚的学术功力，包括在经学、礼学、史学等传统学术上的长期积淀。赖玉芹已经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书中存在的些许问题，恰可成为她此后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博学鸿儒的课题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诸如追踪博学鸿儒在归乡或做地方官之后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与乾隆朝的博学宏词科的比较、“博学鸿儒一代学人”的学术成就，等等。期待她在完成此项成果之后的深化研究，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面世。

学海无涯，书山有路，赖玉芹有执著的信念，有吃苦的精神，我将乐观其成！

吴琦谨识于武汉桂子山

2009年12月28日

绪 论

一、引言

历史上的士人，是社会的知识阶层，向上可以影响统治者的政策决策，向下可以引导教化民众。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染，他们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进亦忧、退亦忧”的社会责任感。关于士人的话题，总是让人兴味盎然。

明末清初之时，社会动荡，变革频繁，各种思想、思潮不断涌现，活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士人，以其火热的激情、凛然的气节、活跃的思想、博大的学术彪炳史册，震撼和激励了清代以及近代的仁人志士。

明清之际的士人，尤其是众多的遗民，他们不仕清朝，气节耿然。他们的事迹，撼人灵魂；他们的著作，启人心智。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朝遗老的晚年，他们对抗清朝的情绪趋于缓和。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朝廷采取的一个重大政治举措，即康熙十八年（1679年）征召博学鸿儒科，使得“一队齐夷下首阳”。虽然这次增开特科的行动，并未真正撼动遗民，多是普通的士人纷纷入彀。但是，随即，康熙将所录用的50名博学鸿儒（以下简称鸿儒）作为主体，修纂《明史》。这对于具有“以故国之史报故国”的遗民来说，有什么比这更投其所好呢？故而，虽然他们仍拒绝直接参与修史，却开始间接地出力襄助。至此，坚冰逐步融化，清廷基本上成功地笼络了士人。因此，要展现清初士人立场、心态的转变过程，通过博学鸿儒群体来分析，无疑是比较恰当的。

梁启超在论“近世之学术”时，感叹道：

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之可以变为清初，清初之可以变为乾、嘉，乾、嘉之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巨且剧

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①。

确为笃论！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的演变，受明朝危亡、明清易代、异族入主等时事的影响甚大。那么，由清初恢弘博大的学术到乾嘉考据学的炉火纯青，其间，又受什么时事和人事的影响呢？以往许多学者分析认为是文字狱的迫害和清廷的高压所致。事实上，在康熙朝的中后期（“戴名世狱”以前），对汉人的思想控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而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这就有必要对康熙的文化政策作具体的分析。其中，博学鸿儒的征召，是其崇儒右文之文化政策的重大举措，对当时的学术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步入清代，高度发展的宋明理学逐渐衰落了。在动荡变革的历史时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众多的思想家、学者在反思和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承袭着明末东林党人的“由王返朱”修正王学的思想脉络，继承和发挥了明末经世致用和实学思潮，着手于崇实黜虚的救亡实学，将理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层次，由重义理的发挥转向对经典的阐释，开启了经学的时代，将学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文献典籍。到了乾嘉时期，经史考据，风靡学界。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学问迅速发展，蔚为大观，成为清代最具特色、成就巨大的学派。那么，从顾、黄等大师到乾嘉学者其间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学术转换和承接过程？由哪些人来具体承接？

笔者将目光集中到受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师深刻影响的学者以及活跃在当时学界的人物诸如阎若璩、胡渭、万斯同等人身上。大致分析顾、黄等大师及阎、胡、万的交游状况就会发现，他们与博学鸿儒朱彝尊、潘耒、毛奇龄、汪琬等人往来密切，不断切磋学术。而且，都在博学鸿儒开科期间会聚京师，参与《明史》、《一统志》的纂修。笔者将他们称为鸿儒一代学人，并将之与顾、黄等大师区别开来。因为两者的学术风格、研究宗旨、研究内容既有相同之处，有承袭，更有迥异之处，发生了由通经致用之学向经史考据之学的转变。鸿儒一代的学者，开始注目于经史的考据，致力于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总结，经世致用精神和民族思潮淡化了。学者们以经学为己任，具有保护文献的高度责任心，其兴趣开始在“道问学”中寻求知识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直接开启了乾嘉学派。

鸿儒学人深受遗民的影响，承袭了遗民身上的一些重要特征。美国社会学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家刘易斯·科塞在研究近代知识分子时说：“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①而有文化知识、受过教育的人，或者是一切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的人，在他看来并非都是知识分子。他称知识分子为“理念人”，认定其特征的几个方面是：（1）超越现实的具体工作，笃信一种广泛的价值体系；（2）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3）具有一种自我意识，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度。笔者以为，明清之际的士人尤其是遗民，具有某些类似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诸如他们的自我意识，对当朝的“批评”态度，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区分“亡国”与“亡天下”，不仅仅是挽救和复兴危亡中的政权，而是要应对所面临的文化危机，拯救整个民族；他们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政权的“清议”者，提出建立一种新的、符合自己理想的社会构想；遗民不顾自身的困窘处境，超越私人的狭小天地，心系国家和社会；他们游历于政权之外，“朝不坐、宴不语”，保持独立的精神人格。在遗民的影响下，清初的其他士人也有类似知识分子的特征。康熙十八年征召的博学鸿儒，其政治立场与遗民迥异，为康熙所羁縻和笼络，无法像遗民那样做政权的批评者，而只能试图充当清廷顾问的角色，以影响清初政治文化的进程。结果，在康熙与这些士人的交涉中，康熙最终牢笼住鸿儒。在清廷的完全掌控之中，鸿儒不甘于被禁锢，故他们与政权的合作难以长久维持。正如科塞所说：

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即使是作为掌权者顾问的角色经常能为决心影响政治事件进程的知识分子带来某些成功，他们与掌权者的关系通常还是不稳定的。或迟或早，大多数知识分子会发现他们不得不作出选择：要么对掌权者唯唯诺诺，成为廷臣、专家或技术人员，要么回到自由、自主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地位上去^②。

由于各种原因，甚至是有些无奈，大部分鸿儒离开了朝廷，归居田园。他们“难进易退”的心态，说明他们不甘心对朝廷唯唯诺诺，并力图保住自己狭小的自由空间。他们同遗民一道，批判旨在追求功名利禄的俗学，也很鄙视朝中那些为了一己私利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人。他们愤世嫉俗、刚正清廉，以

^① [美] 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151页。

及执著、坚毅的禀赋,最终铸就了其类似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这种甘心归隐的心态、狷介的行谊、执著追求精神境界的特性,是他们潜心学术的有利因素。

清初士人接受的主要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儒家所谓的“道”。这个“道”既可通过政治途径来实施,还可以借助文化传播和教育来实现。因此,遗民和解甲归田的鸿儒既需要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又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不甘避世。一旦不能借助政权的途径,他们的满腔抱负便通过学术文化的研究成果推行于社会来实现。

清初士人理想中的“道”,具有民族的代表性和永恒的价值。宋明理学已经逐步丧失了它作为人们的精神动力和调节社会的功能。于是,在明末实学思潮的冲击下和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学术思想内在理路发展的趋向将士人们导向了经学领域。他们力图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探求圣人立言的原始含义。这样,经学成为清初士人用以体现自身价值和实现抱负的最佳途径,成为他们追寻“道”的重要园地。而当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意识形态一统天下后,对于遗民和归隐的鸿儒而言,经学又成为他们用以发出自己心声的工具,以示他们有别于正统思想,也是他们批评理学的有力武器。

总之,清初的时代、社会、思想学术的发展形势,以及士人身上所固有的类似知识分子的特征,最终将他们导向了经学研究的领域。博学鸿儒一代的学者,顺应学术思想发展的潮流,继清初诸大师而起,沿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路径,一改宋明空言说经积习,主张以经史经世,汲汲于训诂考据,走上了博稽经史的为学道路。正是他们承上启下,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的转换、由通经致用之学向经史考据之学的转化。经过他们的倡导和努力,学术发展的脉络更加清晰,经史考据之学逐步登堂入室。

二、研究前史及评析

博学鸿儒科作为一代抡材大典,清代的相关记述和研究也不乏其人。

在康熙、雍正时期,笔记、文集中记载康熙博学鸿儒科的有:毛奇龄的《制科杂录》、施闰章的《学余堂文集》、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全祖望的《词科摭言》、沈德潜的《博学宏词考》等。乾隆时期,又有李集所辑的《鹤徵录》、秦瀛等编的《己未词科录》,这是两部专门记录博学鸿儒情况的书籍,包括鸿儒们的著述、简要经历、交游情况和逸闻趣事等。这类书籍成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和具体细节大有裨益。不过,因为作者是亲历之人或者是出于同一朝代,因此不免存在一些局限,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统治者的恭维。而且,作为当局者,他们无法揭示当时学术对后来的影响所在。

民国时期,孟森先生撰述《己未词科录外录》^①一文,站在有清一代盛衰兴亡的历史高度,探讨了己未词科的历史真相及其对清代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但许多问题引而未发。另一学者袁丕元编纂《清代徵士记》^②,较乾隆时期按鸿儒录取的名次排序的编纂有所不同,他按地域分类来记述博学鸿儒群体,有利于启发学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问题。不过,该书仍重于记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少数单篇研究博学鸿儒的论文外,尚未发现有已出版的专门著述。其中,研究博学鸿儒的论文有张宪文的《清康熙博学鸿词科述论》^③、赵刚的《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政治变迁》^④、尹彤云的《康熙十七年“博学鸿词”科略论》^⑤、杨海英的《康熙博学鸿儒考》^⑥、孔定芳的《论康熙博学鸿儒科之旨在笼络遗民》^⑦及《论清圣祖的遗民策略——以博学鸿儒科为考察中心》^⑧等。这几篇文章对博学鸿儒科作了综合性的专题研究,从康熙帝主持活动的目的、收效、鸿儒们的进退等情况开展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诸如对康熙“右文”提出质疑,由此科分析出当时南北士绅集团的形势,分析康熙对江南大族恩威并用的计谋,这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博学鸿儒科,了解当时清廷笼络士人的政治意图,以及该科在政治、社会乃至此后清王朝政策的制定中所产生的影响。不过,上述文章几乎都没有涉及此科对学术文化发展的具体影响,没有结合政治、文化背景来考察当时的学术。

在有关清初的学术、政治的著作中曾涉及博学鸿儒科的人物。如徐海松的《清初的士人与西学》一书,探讨了博学鸿儒与传教士的关系及其研究历算学、学习西学的情况。邸永君在《清代翰林院制度》一书中,把博学鸿儒群体作为征召入翰林的特科进行分析,将博学鸿儒与乾隆词科相对比,揭示这一举措的目的、收效、统治者对士人的态度等问题。这类研究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把博学鸿儒作为其书的一个章节。这种做法角度新颖,反映出了博学鸿儒学术的一些侧面以及影响。

而专门研究鸿儒学人学术的论著,目前还较有限。中国台湾林庆璋先生有

①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袁丕元:《清代徵士记》,民国石印本。

③ 《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

④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1期。

⑤ 《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⑥ 《历史档案》1996年第1期。

⑦ 《唐都学刊》2006年第5期。

⑧ 《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关博学鸿儒朱彝尊的专著,探讨了朱氏辨伪、考证等成就。近年来,关注这一时期的学者逐步增多,出现了一些研究鸿儒学人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毛奇龄、汤斌和朱彝尊等人身上。毛奇龄颇受人关注,有一些著作及论文涉及他在实学、礼学等方面的思想和成就。如黄爱平的《毛奇龄与清初学术》^①一文,肯定了毛奇龄在修正王学、批判朱子以及在经学上探索治学途径、开辟研究领域的贡献,指出了毛奇龄开启后学之功,该文将毛奇龄与清初学术转换的关系揭示出来,将毛奇龄的研究引向深入,很有价值;华东师范大学2008级张贺的硕士学位论文《毛奇龄的学术简论》对毛奇龄的学术及交游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程二奇的《毛奇龄推易始末与清代汉学之复兴——清学史源流的一个新认识》^②对毛奇龄在学术史的地位进行了探讨。河南大学2005级李祥东的硕士学位论文《汤斌理学思想研究》以及《汤斌及其理学思想》^③等论文,主要对汤斌的理学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尚未注意到汤斌在清初学术向经学转变方面的贡献。《朱彝尊的藏书实践及其目录学成就》^④、《朱彝尊与晋祠文物考略》^⑤、《朱彝尊简论》等一些小篇幅的论文,叙述了朱彝尊在藏书、文物考证和目录学上的成就及贡献,尚未结合清初的形势分析朱彝尊保护典籍的意识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所在。还有人整理了《徐钊年谱》^⑥,这些都说明人们已开始注意博学鸿儒学人的学术成就及其作用,但相对于50名鸿儒来说,仅仅是对鸿儒个体方面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清初的学术是由理学向经学(考据学)转变的重要阶段,也是明清之际的大师学术向乾嘉学派传承的阶段。因而无论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哲学史的学者,还是研究清代学术(如经学史)的学者,都要关注这一阶段。前者着眼于儒学的发展演变,需要探讨理学的衰落,需涉及明末清初的学术;后者在研究乾嘉学派时,要探讨考据学的起源及演变过程,也需要论及鸿儒一代学人。因此,论及鸿儒学人的著作不在少数,诸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陈祖武的《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杨向奎的《清儒学案新编》,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美国学者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

① 《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② 《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

③ 《学习论坛》2006年第1期。

④ 《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⑤ 《文物世界》2006年第6期。

⑥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谢国桢的《明末清初的学风》，等等。这些著述，对于清初学术的总体把握准确，提出的有关清代思想学术的理论，观点新颖、得当，对后学有重要启迪作用。

钱穆、梁启超两位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双璧辉映，各有特点。钱氏对清初的学术有详细深入的论述，观点得当。诸如对毛奇龄、阎若璩二位的品性、人格、学问进行分析，并将这二位与顾、黄大师作对比，明显地看出他们在治学品德上以及研究宗旨上的大异其趣，以及在经史考证上的一脉相承。作者还对李塨与毛奇龄的关系、戴震与颜李学派的渊源作了精辟论述，对后学沾溉良多。梁启超研究的出发点是：朴学的兴起是“以复古为解放”，是对理学的反动，他将中国学术思想上的转变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他认为清初学者是“为政治而学问”、“考据学正式形成于顺治、康熙间”。钱、梁两位对鸿儒学人的研究重视不够，对于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学术转变没有深入分析。

陈祖武先生的《清初学术思辨录》是全面反映清初学术的著作，该书细致地分析了顺治、康熙两朝学术的诸多问题，如清初学术的探源、发展趋势、历史地位、文化政策的批判、经学考据学风的酝酿等，并专门研究了清初理学、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该书确系全面探讨清初学术的一部力作，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分析。著者还揭示了清初学术发展的某些规律及学派之间的关联，如颜元思想的形成深受王学后人孙奇逢的影响等。在方法上，作者还采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全面分析了学术发展的思想渊源、社会、文化背景。不过，该书难以面面俱到，对博学鸿儒如清初学者之一的朱彝尊就重视不够。因为无论是朱氏的学养根底，在经史考据、目录学上的成就，还是他与士人的交游、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都是引人注目的。

陈祖武先生认为，对理学的总结和批判是清初的时代课题，进而透过批判理学的思潮来分析许多学术问题。笔者以为，这个观点与梁启超的朴学是“对理学的反动”相一致。清初的确是宋明理学的衰落、崩解时期，但不能将批判理学作为清初学术的主脉。清初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反理学”、“反道学”，除了颜李学派主张“习行”、实践，对宋明理学一概而论地反对外，其他人多是批判王学末流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和近禅的风气。清初无论是理学家，还是经史学者，都增添了崇实、务实的时代内容，应该说是“尊经”、“崇实”的清初时代思潮。而对于程朱理学的攻击，应属于理学内部朱、王学派的门户之争。康熙将理学改造之后，将之作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理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不过，从清初开始，就有学者将理学置于不议不论之列，而真